

读《中国革命中的 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 ——基于该书中译本的评说

李秉奎

从 1960 年代以来, 英语世界涉及中共抗日根据地史、农民运动史的研究, 每十年左右便会产生一部阶段性的代表作。^① 2000 年, 澳大利亚的大卫·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教授出版了他的新著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 1945*^② (中译本《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该书被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评为, “首次以著作的形式”、“首次从县级的层面”对太行

① 简言之, 这些代表作似应包括以下几种: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 1945*(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 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Edward Friedman et al.,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一书, 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只是占了其中的一部分。

②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抗日根据地社会及政治变迁进行研究的重要作品。^①该书能否成为新世纪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作？凡是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或许对该书都有一读为快的心理。

古德曼教授，曾执教于西澳洲墨朵大学(Murdoch University, Western Australia)，现任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院长。古德曼教授所著的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一书^②，曾在中国国内翻译出版。由于目前关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出版物中，除了太行根据地历史的直接参与者齐武先生的两本专著^③，其余更多的则是以集体合作的形式完成的^④，古德曼教授以个人之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的研究，因此值得充分重视。早在研究邓小平生平之时，古德曼教授就开始注意到太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一生中有十年之久的时间是在太行根据地中度过的，西方学者对于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经历的研究，“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文版前言”，第2页。下文凡涉及该书者，只标注页码)。这样，从

① Back cover, David S. G. Good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 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② London: Routledge, 1994. 中译本名为《邓小平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如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就是中共山西省委牵头，由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协同完成的；霍云桥、郝玉门主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河南部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是由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

研究邓小平革命生涯开始，古德曼教授经过十多年的资料搜集与实地考察，终于写就了这部有关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著作。

—

《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全书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古德曼教授花费了较多笔墨，从战时军事秩序、政治秩序两个角度，较宏观地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中日、国共两方三派共存的华北社会全景。在作者看来，“根据地的建立自上而下依靠军事和政治的支持，至少比社会变革重要”（“导言”，第5页）。事实也的确如此，八路军及其地方游击队的强弱，甚至他们同日军、国民党军队力量对比的细微波动，几乎都会直接影响到根据地历史发展的具体走向。中共太行根据地的文件，常常会以敌对双方的军事行动作为分析形势变动的界限，这也就不足以为奇了。中共在总结党的组织工作时，也常常会提到“敌人第一次进攻”^①、“和辽战役”^②、“三次‘扫荡’”^③等军事形势，并以此来分析此前此后的中共党组织的具体变动。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甚至在一份《榆社干部研究材料》中，也会以“九路围攻”为界来观察党组织及政权的变动。^④将国共两党关系、中日民族战争的实态尽

① 如《中共晋豫边地委对全区工作历史的检讨》，《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② 如《一九三九年工作总结与一九四〇年工作计划的报告》，《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③ 如《十三县三十九个支部的初步研究》，《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7页。

④ 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榆社干部材料》（1944年11月），山西省档案馆藏件，卷宗号：A01-02-00041，第5.8页。

最大可能地复原出来,这对于治中共抗日根据地史来说,无疑是一个研究的前提。其中,更让根据地境况流动不居的是,太行根据地前期历史中,曾出现过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与“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些力量的卷入又增加了根据地内部军事形势、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古德曼在第一章中首先谈“统一战线”、“抗战与内战”、“日军的‘扫荡’”等内容,这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只有以宽广的视角把当时的历史场景拉到读者眼前,才能铺垫出整个太行根据地历史的总背景。然而,中共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又不可能仅仅依赖军事武装就可告成。在克服战争与经济困难的同时,中共在根据地不能不进行其组织的发展,即扩充党员、进行组织建设。这些政治行为使得更多的地方精英“走出家门”,更深层次地卷入根据地的建设与变革当中去。党的纪律、党员、党的干部,这三者是中共组织建设的三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些,古德曼教授并不像部分的研究者那样,使自己的行文深深地陷进中共战时所制定的条文、召开的会议当中,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随着局势的变动而变动,尽其最大可能地详细刻画中共上层的政治意图以及这些意图如何在地方得到实行。在其后的章节中,古德曼教授按照这一分析路数,对辽县(左权)、武乡、黎城三个县进行了详细的个案考察。

作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政党,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广泛的社会革命确定为自己努力的远大目标,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生存绝非是其最根本的追求。在抗战时期民族革命的大背景下,统一战线的策略往往与群众运动的发动同时或前后存在着,在具体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后者又常常显得更加重要。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古德曼主要是从“社会改革”的角度阐述太行根据地的革命,其中包括政治动员、减租减息、中农问题等几个方面。通

过其详尽的论述,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静悄悄的革命”^① 在太行根据地的发生。作者一再小心翼翼,但是结论却也凿凿: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确实发生过一场“目的和效果两方面都是革命”的革命。与冀中的五公村所不同,“这里革命暴力的程度要高得多,农村的阶级磨擦并非时时处处地存在,但也从未消失过”(第 278 页)。该地区甚至因为政策执行上的“激进”而多次受到上级党的严厉批评,有一个县的领导机构还因此被解散。由于曾对发生在黎城县的离卦道暴动有过专门的研究,作者在最后一章中浓笔重墨地对这场持续时间不长、但格外引人注意的中共力量与地方反对势力的碰撞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黎城的个案研究一下子把该部分的讨论引向深处,通过此一节,作者得出中共势力在进入根据地后,尤其在进行社会改革之后,乡村社会政治力量对其所作出的反应。除此精彩一处之外,如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一样,作者只是一板一眼地对左权、武乡两个地方分别从政治动员、中农问题、减租减息、阶级变动等几个侧面一一进行了论述。

在这场“风搅雪”一般的战争中,中共何以从民族战争、国共纠葛中取得胜利?这是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领域研究中都难以摆脱的终极问题,也是我们阅读中共抗日根据地史著述时一个习惯性的潜在提问。然而,正如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所说,这种提问方式也存在着思维的死角:如果我们选择中共如何从各

① 弗里德曼等人在对冀中五公村的研究中,提及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实行的“静悄悄的革命”(详参 Edward Friedman et al.,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如果上溯到抗战时期,我们会发现当时的华北根据地中已经较普遍地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这种“静悄悄的革命”在抗战时期就开始发生了。陈永发将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称为“无声的革命”,与此可谓异曲同工。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本)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1 年 8 月版,第 359—363 页。

种政治力量中最终胜出这个角度来考量这段历史,我们无疑会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中共所取得的成就或其令人满意的地方,从而容易忽视中共如何将其设想、打算付诸实施,这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会使陷入一种自问自答的陷阱。^①古德曼教授能否从这种“由果寻因”的模式中跳出来,细致入微地考察中共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的得失,读者或许在细读该著作前,会潜意识地为其捏一把汗。

在《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一书中,古德曼基本上将其研究视野限定于太行根据地的辽县(左权)、武乡、黎城三个县。这三个地方是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曾被中共确定为“实验县”,以求从中取得具体经验,来指导整个太行根据地的工作。同时,作者“选取这样狭窄的地理位置为中心点”,“通过调查可以形成大量的材料”(“序”,第3页)。正是由于着眼于“狭窄”的研究点,古德曼教授一反在《邓小平政治评传》(*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一书中所采用的白描手法,从太行抗日根据地政治秩序和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社会变革两个方面入手,采用近乎工笔一般的精雕细刻,把研究的侧重点从以前研究者普遍所关注的、中共上层领导的讲话和文稿上移开,转向实践层面上根据地政策在战争环境里的具体变动,特别是从三个县的资料着眼,详细考察军事斗争、政治动员、党组织建设、政权问题、生产运动、土地问题、减租减息等在三个地方的具体实施。作者力图“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发展与建设放到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在把握战时特殊环境的同时,着重探讨根据地内部的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特别

^① Lyman P. Van Slyke, Foreword,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是有关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中文版前言”，第6页），从而使中共根据地的历史真正地得到复原，使“扁平的”、“躺在纸面上”的历史站起来，并随着战争的紧锣密鼓，舞动起来。与其他同一主题的研究有别，古德曼教授并未特意地将所要论述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单独分析，而是把这段历史放回到具体的时空环境中去，力图寻找根据地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让历史本身“原汁原味”地来自我表白。

虽然这样的写法能够使历史中的各个纽结自然地相牵连，充分铺开当时根据地三个地域内不同的革命众面相，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样的表述方式仍有其遗憾之处。在每一总目录下、在各个县境内，尽管其论述的侧重点会有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却总会使人感觉到交错更迭的纷乱，头绪很多，近乎是“剪不断、理还乱”。当然这与战时的革命复杂场景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但是这种写法却也值得商榷。古德曼自己也清楚地说，“战时的每个县，就是一个相对独立活动的小社会，每个县的社会变化，都具体反映整个根据地社会变迁的进程”（“中文版前言”，第6页）。把研究的焦点对准细微处，然后再将其放大，并置之于“大背景”中，这无疑是一种深入研究的路径。但是把每个县按照相似的模式一一展开，这往往容易形成一种“区域性的大叙事”。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缩小了范围的根据地史，读者想更加细致入微了解历史实态的愿望并未因此而得到酣畅的满足。

二

力争与史实最大限度的贴近，这是一切史书立论的基础。史实性的不准确乃至谬误，是史学作品中最不应该出现的“硬伤”。古德曼教授在《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一书中，

由于将主要精力限定于辽县(左权)、黎城、武乡三个地方,这样一方面可以尽最大可能地使其论述丰富、细致起来,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考察上却又要冒顾此失彼的风险。不知是工具性资料还不能满足其如此精细的考察,还是由于其写作过程中的仓促,通读全书后,读者或许能发现其中尚存在着再推敲的地方:

关于八路军改编问题。国民党欲将八路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的时间,作者称:“到1937年底国民党要重新编排八路军时,八路军已发展壮大,家喻户晓,遍及整个华北地区。”(“序”,第6页)实际上,这一事实并非是发生在“1937年底”,而应在1937年9月。1937年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在一份通令中称:“顷奉南京军委十一日申电闻,着本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任朱德为该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①由此推断,南京方面改编八路军的电报,其发出的准确时间应为1937年9月11日。在古德曼教授自己的另一著作中,也提到“1937年9月,按照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②古德曼教授这种史实上的“前后”矛盾,不知因何而起。

关于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地区的转移时间与地点上,该书的表达也有多处值得细究。如称“八路军总部1938年4月到5月在武乡呆了一个多月”(“导言”,第13页)。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因为“4月14日,八路军总部抵沁县北之义门”,4月20日,又“移沁源

^① 《朱德、彭德怀关于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1937年9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另外,发行量较大的、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一书中,也有“在九月十一日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字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4-515页)。《朱德传》一书或许是作者能较容易见到的。

^② 《邓小平政治评传》,第69页。

北之上寨”。^① 即八路军总部在 1938 年 4~5 月间, 至少曾经转移到沁县、沁源, 而不是简单地“在武乡呆了一个多月”。其后, 古德曼教授又称八路军总部“从 1939 年 7 月到 1940 年 10 月中旬先在武乡县砖壁村然后是王家峪村”(“导言”, 第 13 页)。实际上, 在作者所说的这一段时间内, 八路军总部也不只是仅在这两个地方停留过。在 1939 年 7 月 7 日, “八路军总部由潞城县北村抵襄垣县普头村”, 7 月 11 日“抵黎城县河南村”。^② 也就是说, “从 1939 年 7 月到 1940 年 10 月中旬”这一时间段内, 八路军总部至少还在潞城、襄垣、黎城等县做过停留。而其后作者所称“1940 年 11 月到 1945 年 8 月在辽县的武军寺村和麻田, 其间有 20 多天回砖壁村”(“导言”, 第 13 页), 这也与史实不完全符合。因为在此期间的 1942 年“5 月 23 日,(彭德怀) 同左权率总部及直属队从辽县武军寺驻地转移到麻田镇以东之郭家峪”, “5 月 24 日, 移至辽县与黎城县交界处十字岭东南之南艾铺村, 被日机侦察发现”^③, 而此后左权牺牲。那么由此推断, 在作者所提到的时间段内, 八路军总部至少并不是只在武军寺、麻田和砖壁有过停留。至于“1940—1945 年间, 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中共北方局均驻扎在县南的麻田”(第 75 页), 这一说法的不确仅从上文就已能得出。在该书的第 98 页中, 作者称:“八路军总部从 1939 年 7 月到达晋东南后至 1940 年 11 月转移到辽县期间, 就驻扎在这里(指武乡, 笔者), 开始在砖壁, 然后在王家峪村。”作者所依据的《八路军总部在麻田》一书对于此事实的记载, 也确存在偏差。在此期间, 八路军总部曾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9 页;《彭德怀年谱》,第 214 页。

③ 《彭德怀年谱》,第 266 页。

于1939年7月7日“由潞城县北村抵襄垣县普头村”，7月11日“抵黎城县河南村”。^①1940年11月6日“八路军总部由茅岭底抵河北涉县东南之刘家庄。7日，抵大林口。8日，抵辽县武军寺”。^②显然，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地区实际的转移情况要比作者所写的要复杂得多。此外作者对于左权牺牲的情况叙述也似不确。作者称，1942年5月底，“日军25000人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麻田，打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实际上当时日军只有5000人，而左权牺牲的地点不是麻田，应在偏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周围。左权牺牲的准确时间应为5月25日。^③

关于1940年国共双方在晋东南分界线的划分。古德曼教授认为，“朱(德)与卫立煌达成协议，八路军从邯长路以南撤出，集结在林县、陵川”(第43页)。然而，林县、陵川基本上处于邯长路以南，“从邯长路以南撤出”与“集结在林县、陵川”两说似相互矛盾。据资料记载和时任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回忆，当时朱德与卫立煌达成的国共两军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北面为八路军活动地区，南面为国民党军队驻扎范围”。^④但在最终撤军时，这条分界线具体是在漳河以南的林县姚村以北和平顺壶关以南的大井至郭家沱一线。^⑤这条分界线虽然比原来的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略向南移，但是仍然把林县的大部分及陵川的几乎全部地区划在外，因而“八路军从邯长路以

^① 《彭德怀年谱》，第214页。

^② 《彭德怀年谱》，第239页。

^③ 《彭德怀年谱》，第266页；《太行山抗日斗争大事年表》，第142页。

^④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山抗日斗争大事年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⑤ 详参《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14页。

南撤出”和“集结在林县、陵川”之说似不能成立。

有关时间的不确之处。作者称，武乡早期的共产党员李逸三“1926年毕业后去了武汉，考入中国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100页）。李逸三是太行根据地历史的重要参与者，然而他是在“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同年12月由校友严育英（四川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武乡籍第一位共产党员”。^①

更为不确的是，在该书第196页，古德曼教授称“随着辽县县委看法的改变，仅1940年后半年就有11804起土地纠纷得到解决”。据该书的中译本称，此材料是引自《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三卷的第55页。经查核，《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三卷的第55页，刊载的是赖若愚于1940年1月所作《两月来晋东工作的总结》。这份“1940年1月”的文件中，从逻辑上来讲，是不可能谈到“1940年后半年就有11804起土地纠纷”，而且该文件的实际内容与此也相距较远。

与此相类似，该书在第201页中称，“图17所示，在1942年初，中共辽县的党员大部分是中农，而到1947年后半年中农人数已占到绝对多数”。^②作者称，这是根据1942年9月20日名为《十三县三十九个支部的初步研究》的材料而得出的结论（第209页）。然而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42年的材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反映出“1947年后半年中农人数已占到绝对多数”这一情况的。

在其他地方，此书还有几处看似不妥。如该书称，“1943年，

① 王建华主编、武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乡人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据此书的“编者言”，该书是由编辑单位“向武乡籍在外工作人员发函征集资料”，对于“迟迟没有回音”者，此书就没有收录。由此推断，有关“李逸三”的条目，该书似更为可靠。

② 此处的“图17”当为“表17”（即“1940—1942年中共辽县县委构成情况”）之误。

李雪峰在辽县四年工作总结中,提出为确保干部素质,应开展思想教育和整风”(第 90 页)。此处,作者并未注意辽县在此时已改为左权县,李雪峰所作报告题目也是《左权四年工作简结及今后工作意见》。^①作者在此称之为辽县,不知何故。在第 99 页,该书称“武乡向来在共产党的记忆中是‘八路军的母亲’”。而当时被称为“八路妈妈”、“革命妈妈”的只是武乡一个叫暴莲子的人^②,而并非如作者所称,将武乡称之为“八路军的母亲”。在第 252 页,称“太行根据地区党委最终不得不介入,撤了一名屈从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新村干部职务。”这里的“太行根据地区党委”(即 the Taihang Base Area CCP Committee,见该书英文本第 248 页),应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③类似的还有,在第 39 页,有“他们很快参加了由 30 多名党员组成的中共平汉线委员会”的说法。此处,将“中共平汉线省委”误作“中共平汉线委员会”。在第 281 页中,作者称 1937 年初建的晋冀豫根据地的范围包括“豫北和冀西南(磁县、涉县等县)”。文中所提到的磁县、涉县现在都属于河北省管辖,当时却属于河南省管辖,因此将“冀西南”置于磁县或涉县之前,都是不恰当的。

① 《党的建设》(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9 页。

② 中共武乡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武乡简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前言”,第 5 页;另外参见张凤儒、李志宽、刘望:《革命妈妈暴莲子》,山西省晋东南“四史”编辑委员会编:《太行人家》,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00 页。

③ 晋冀豫区党委:《检查南委泉问题后的决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党的建设》第 295 页。

三

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所在,史料的运用也是评价一部书稿的重要标准。《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之所以能如此深入细致,首先应归功于其资料的详实。马克·赛尔登认为古德曼教授这一著作的成功,是“基于新的信息资源,其中包括中共最近重新出版的太行根据地资料、太原档案(原文 *Taiyuan Archive* 一词,似应为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之意,笔者注)尚未公开的文件和报告、太行根据地经历者的言谈”。^①为了写作此书,古德曼教授利用一手史料 300 多种,二手史料近 300 种,其中包括大量的档案资料、回忆录,甚至还有地方档案馆所收藏的中共党内的“内部讨论”与“会议记录”(这些材料显然多数并未出版面世)。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曾“2 次到辽县 2 次到武乡 3 次到黎城”,在 1987 年到 1998 年的 12 年间,曾先后 12 次到有关的 11 个地市 37 个县(市)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且还采访了原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宣传部长张磐石、原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原冀鲁豫边区农会主席池必卿。除此之外,他甚至还设法采访到了当年担任太行根据地中共县委书记的霍泛、李修仁、王庭栋等人。这种对史料的挖掘和搜集,就连国内从事中共根据地史研究的人恐怕也不容易做到,更何况这是一位海外的研究者。然而,不知是何原因导致该书中译本的部分史料却存有不确之处。

首先,部分资料名目上出现的偏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书中

^① Mark Selden, recommendation (back cover), David S. G. Good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 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多处将原资料中的一些文件的名称作了更易，结果使得读者难以准确地查到原出处，难以辩明作者所论是否准确。这类问题粗略如下所示：

譬如将《中共冀豫晋省委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报告》误作《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报告》（“导言”，第31页）^①；将齐武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一书误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导言”，第32页）；将1939年7月《杨尚昆给晋冀豫区委的指示信》误为《给晋冀豫区委的指示信》（第64页）^②；将《胡服同志给晋冀豫省委的指示信》误为《给冀豫晋省委的指示信》（第64页）^③；将《中共冀豫晋省委给北方局并中央的总报告》误作《给北方局并中央的总报告》（第73页）^④；将《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工作问题的指示》误作《关于在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后晋东南工作问题的指示》（第73页）^⑤；在第74页，两处将1940年8月《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误作《组织部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⑥，并将《巩固太北根据地与太北党的战斗任务》误作《关于太北根据地与太北党的战斗任务》^⑦；第91页中，又把曾在辽县负责工作的李修仁所作的回忆《我了解的辽县（左权）和顺党的建设和发展》误作

①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33—165页。

②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20—424页。

③ 该文件参见《党的建设》，第106—115页。

④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39—252页。

⑤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09页。

⑥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536—567页。

⑦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95—103页。

《我了解的辽县(左权)和顺党的建设和发展》^①;第178页中,将赖若愚在“县书联席会”上作的题目为《两月来晋东工作的总结》的报告误作为《两月来晋东的总结》^②;另外将《辽县实验县的动员报告》误作为《辽县实验县的动员的报告》(第208页)^③,更严重的是,在第256页中,共有四处将《太行山北区的土地问题》误作《太北区的土地问题》^④;第258页的注中,将晋冀豫区妇女救国联合总会的《关于“反对买卖婚争取自主婚”的初步总结》误作《关于“反对买卖婚姻争取自主婚姻”的初步总结》^⑤;第259页的注中,又将《晋东南的迫切的减租减息问题》误作《晋东南的迫切减租减息问题》^⑥;在第330页的“参考文献”部分,将郭林祥的《劲旅一支出太行》误作《精旅一支出太行》。

其次,引用资料的不严谨。第44页中,“据近来史称:太行根据地内的晋中根据地缩小到仅50里”。这里所说的“50里”是不通的,实际出处是“日军还占领了太行根据地腹心地区的榆社,使太行二分区的活动区域缩小到纵横只有五十华里”。^⑦第49页中称,“选举于1938年底在磁县,1939年又断断续续进行”。在实际的出处中,并无有关选举的内容。而且还将《李雪峰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误作《中共晋冀豫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⑧在第220页,引用何英才的材料,说“该具有

^① 该回忆参见《党的建设》,第572—583页。

^②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53—59页。

^③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664—668页。

^④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306—332页。

^⑤ 该文件参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群众运动》,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424页。

^⑥ 该文件参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120—131页。

^⑦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18页。

^⑧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85页。

900多产业工人，而其中仅30人是党员”。原文是“30余”党员^①，而不是“仅30人是党员”。

与史料原意的不符。如第51页，“除‘三三制’之外，太行根据地还规定，每个地方政府的选举中，至少应有一名女性”。据作者称，这是引自李雪峰的回忆录。但是李雪峰只是提到“各村都有妇女参加村政权”^②，即只是在村政权，而非其所说“地方政府”，该书引用材料时改变了李雪峰在回忆录中的原意。在第152页，该书称“中共的创始者和最早的抗战几乎全部是城市知识分子”。但是在其提供的出处，却发现原意并不是如此。在《池必卿谈太行群众运动》一文中，只是提到“太行根据地创建的基本条件：一、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和山西新军进入太行山区……二、是党领导下的城市的党员和干部、工人游击武装、学生游击武装，进入太行区与当地的党组织和进步分子结合起来。这部分力量，主要搞地方工作。除了太原的一部分以外，就是榆次、太谷的，包括同蒲铁工队、正太线的工人游击队和平定县的学生游击队。多数是进到这个地区才发展起来，这是第二个条件。三、党利用山西的合法形式，已经在专、县两级设立了牺盟会”。^③此处虽提到，“城市的党员和干部”、“学生游击武装”，但是如果忽略了“工人游击武装”，显然与池必卿本人的谈话内容是不相符的。更何况原文并未涉及知识分子与工人分别占多大比例。虽然，知识分子在太行根据地的开辟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如果引用这个材料想说明作者上述的观点，明显是说不通的。因为在中共使用的语汇中，“工人”与“知识分子”显然是两个有着重大区别的词语。

①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801页。

②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13页。

③ 《群众运动》，第262页。

对原文曲解更严重的是，在该书的第 168 页，作者称“和徐子荣的调查报告(即徐子荣的《在中共晋冀豫区委组织部上的报告》，笔者注)同时出版的还有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十分明确提出了一个问题：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此处，作者将 1942 年 9 月 20 日的《十三县三十九个支部的初步研究》称之为“评论文章”(原文用 commentary 一词，参见英文本第 169 页)，已经有所不妥。而后文所提到“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实际是在 1941 年冀西扩兵时的教材中，曾有“革命为了什么”的内容。^① 这本是《十三县三十九个支部的初步研究》引用其他材料中的一句话，不能说是它“明确提出”的问题。第 187 页，该书称李修仁“回忆说，1936 年从中国东北来了一个革命学生，作了一次演讲，但是没有什么响应”。实际原文是：“一九三六年以前，辽县没有共产党组织。在教师、知识分子中能听到一点点抗日的事，但是没有武乡、黎城的革命学生活动。一个东北抗日救亡学生到县立高小宣传抗日，反映不强烈。辽县悄悄的。”^② 一字之差，一个说是“1936 年以前”，一个说是“1936 年”，结果就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错误偏差。所以，“1936 年从中国东北来了一个革命学生”与原文并不相符。在第 188 页，该书也有错误。据其称“一个 20 岁的雇农记得他是被一个从东北来的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吸纳的。他们是第一次见面。这位雇农很快就受到培训去当干部”。这些内容与原文也是有出入的。首先，原文并没有类似“十八九岁”的字眼，而且“一个从东北来的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实际上是八路军工作员，但该书只是讲他是个大学生，却不提他是八路军工作员，似有误导之嫌；其次，“第一次见面”也是

① 《党的建设》，第 288 页。

② 《党的建设》，第 572 页。

原文所没有的。^①在该书的第190页，“1938年曾有一场保证合理税收制度的运动，却进行得虎头蛇尾。一个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说，运动不成功是因为他们的做法太偏激了”。其中的“虎头蛇尾”一词与原文不相符，该原文称合理负担与组织贫苦农民借粮两件事“大得民心”，认为运动太偏激的不是合理负担，而应是借粮运动。原文是“对借粮运动这件事，当时有争议，有人说‘左’了”。同一页中的另一个不当之处，“他组织了1000人的队伍去县政府请愿，虽然县政府撤掉了那个顽固乡长的职务，但他们拒绝引进普选制”。该书所称的“组织者”是张树藩，原文本意却是指区委。并且，组织了“1000人”与原文的“上千名”也有细微差别^②；在第199页中，“由于战争频繁，加之各种首脑机关都驻扎在这里，所以辽县南部的人口就增加了很多。据李雪峰说，增加的人数大约有20000”。作者称该材料是引自《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的第176页，但查此书却发现其中的第175—176页却并非此意。原文称：“当时太行区内有4万多部队、2万多地方工作人员，大大超过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③李雪峰是讲整个太行区的地方工作人员有2万多，而其引用却成为辽县南部“增加的人口数为20000”。这与原材料极不相符；在第217—218页中，该书称“还有包括洪水、石门等支部在内的另一组，因其‘阶级成分不好’，被认为极其不完善，要求其解散”。但是原材料只是讲洪水、石门“这些地区是成份不好，瞒上欺下，自私自利，不顾群众路线，不走阶级路线，全支部被不良分子压住动不起来。因此，这里应注意从改造成份整

① 《党的建设》，第584页。

② 张树藩：《在左权工作的回忆》，《党的建设》第584页。

③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76页。

理组织,创造实支”。^①“洪水、石门等支部”与洪水、石门“这些地区的支部”有所差距,原材料中只是提出“整理组织”,而不是“要求其解散”;在第 249 页该书扩大了材料的原意,称“妇救会也吸取教训,开始改革婚姻习俗,提高妇女参政率。”实际原文仅谈到了婚姻变革问题,却并没有谈到“妇女参政”或“妇女参政率”的问题。^②

使用的材料与原材料的内容严重不符。如第 190 页,“唯一的例外是减租减息运动发现了一些农民因欠债太多,而将土地给地主。这一部分人被吸收入了党”。这与材料的内容恰好相反,原文称“一九三九年的抽地换约运动搞得比较好,抽地换约运动就是把过去的高利贷的利息,统统定为一分半,减息,把旧契约抽掉,换成新契。贫农过去借高利贷的帐统统按低息计算,结果,地主因放高利贷反而欠了农民的,超过本利,农民就彻底收回土地。这一部分农民中,有的原本是破落地主,他们的子弟有的因此参加了革命,后来被教育成为党的骨干”。^③这个材料原本语句有些含混,但这里绝不是“农民因欠债太多,而将土地给地主”,而是与此相反,“地主因放高利贷”在抽地换约运动中反被农民收回了土地;另外一处是在第 192 页:“1939 年 10 月,辽县的中共党委号召成立了一个仅仅吸收雇农和贫农的农民协会……辽县党组织大力呼吁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进行一场完全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且下决心要消灭地主和富农”。在原材料中,当地的党组织只是提出在“农会:自下而上一级一级地改造,建立雇农小组,要有 1/3 贫农,地主富农应坚决洗刷”。^④所以号召“成立”“农民协会”,与原文的“改造”

①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3 卷,第 270 页。

② 《群众运动》,第 419 页。

③ 李修仁:《我了解的辽县(左权)和顺党的建设和发展》,《党的建设》第 575 页。

④ 《辽县实验县的动员报告》,《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2 卷,第 666 页。

“农会”并不相符。原意也并非要“消灭地主和富农”，“消灭地主和富农”显然是违反背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基本政策，实际应该是在农会组织里“洗刷”地主富农。而作者称后面的“这次土改就是先将土地和财产收归公有，然后进行重新分配”，这也是与原材料及当时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更有甚者，在第 193 页，“在 1940 年早期的那个阶段，辽县是受着‘唯阶级成份论思想的影响的’……工人们怨声载道”。据其引用材料的原文称，“一九四零年整顿党组织，有唯成分论倾向，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叫异己份子”。^①这里材料本意只是谈在整顿党组织中所出现的“唯成分论倾向”，但引用者却扩大为辽县整体。虽然中共组织内的情况会与周边情况有着直接联系，但是用党内整顿组织的倾向，去贸然指称整个辽县，这不是偏向的问题，根本是史料的误用。而后一句“工人们怨声载道”，在其引用的材料中却根本无此类内容；与此类似或者更严重的是，在第 193 页中，作者称“某一个农村对知识分子待遇不公，村里有 3 个大学生，3 个高中生和 20 个中小学生，村里‘逼’着他们建起了一所乡村夜校。在这位干部看来，这种作法有些大材小用，因为这些人更适合于做一些广泛的教育和宣传工作”。但原文是“我曾见到一个村子有 3 个大学生 3 个中学生 20 余个高小毕业生，而我们支部团结他们的方法是强迫他们上‘农民夜校’，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而应严格纠正的”。^②首先，不是 3 个“高中生”而是“中学生”，不是 20 个中小学生而是“20 余个高小毕业生”；其次，不是“‘逼’着他们建起了一所乡村夜校”，而是“强迫他们上‘农民夜校’”。一个是“建”，一个是“上”，这里的差别是有着较大距离的。最后，“在这位干部看来，这种作法有些大材小

① 《党的建设》，第 577 页。

②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3 卷，第 716 页。

用,因为这些人更适合于做一些广泛的教育和宣传工作”,这显然是把“上”误作“建”,从而作者自己猜测的内容,不仅不是“这位干部看来”,而且与“这位干部”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差距。

注错出处。在第 194 页中,作者在注明“表 17”的资料来源时,称“1940 年的数据,见杨代夫:《辽县实验县工作总结》,1940 年 10 月,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3 卷 703 页”。但实际上,该资料的第 703 页是署名“若愚”(赖若愚)的《二分区正太战役及晋中反“扫荡”战役配合工作总结》,其所说《辽县实验县工作总结》是在第 711 页至 726 页。在《辽县实验县工作总结》一文中,有一个是有关党支部成份构成的统计(见《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3 卷的第 713 页),但这并不是关于县委构成的,应为辽县所有支部的构成情况。此后的第 717 页给出了区村级的领导成分构成变动统计,但这是有关政权的,也不是关于县委成分构成的。除此之外,并未见到其他有关县委成分构成的统计。在第 195 页,“据县委书记杨代夫(实际应为杨待甫)说:‘事情并不完全像计划中的那样进展,但还是一直遵循了我们所倡导的那种精神’。”据作者注释中所称,是引自《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三卷第 275 页。但笔者查核后,却发现该页中并无这样的话,而与此意接近的材料是:“实验县不但有它完整的计划,而且实验县工作者有为完成这个计划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因此它在领导上有一个贯彻始终的精神,这就是实验县开始前必要的先决条件和慎重开始的具体表现。”这里根本没有谈到土改,如果把杨待甫谈实验县的材料用到“土改”方面,显然就是张冠李戴了。

以上诸多不确之处,有的是作者在原作品中就出现的,也有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造成的。其中因后一因素造成的不确还有多处更为明显:

人名方面。第 33 页中,将与魏宏运合著《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的左志远误作“陈志远”。第 90、206 页将张树藩误作“张树潘。”在第 194、195 页，前后三次将时任辽县县委书记的“待甫”（即杨待甫）误作“杨代夫”。第 259 页，将“黄远”误作“黄原”。另外在翻译学者人名过程中，也常把所熟知的人名译成学界“陌生”的面孔，如将陈永发(Yung-fa Chen) 译作“陈运发”（第 9 页、第 28 页、第 325 页等处）^①。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 译作“菲利普 CC 黄”等。

组织名称方面。在第 190 页，“乡里的一个中共干部和由县政府任命的该乡乡长有一些磨擦，他想利用这次运动的机会争取普选制度，这也是当时中共计划中的一部分”。此处的“乡长”实际应为“大编村村长”。

政治术语方面。如在第 190 页，称“1938 年曾有一场保证合理税收制度的运动，却进行得虎头蛇尾”。此处的“保证合理税收制度的运动”（原文使用的是 *a campaign to ensure a more equitable tax burden*，参见英文本第 187 页），应该是指中共文件中常常提及的“合理负担运动”。

地名方面。如在第 278 页，将弗里德曼等人研究多年的河北“鼎鼎大名”的五公村误作“武功村”。

时间方面。时任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长徐子荣的《整党与建党是目前的严重任务》，是 1940 年 4 月 15 日所作，该书英文本也是如此之称。^②而中译本却误为“5 月 15 日”（第 178 页）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德曼教授在《邓小平政治评

① 在古德曼教授的《邓小平政治评传》的“中文版前言”第 6 页中，曾将陈永发误为“陈云发”。

② David S. G. Good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 177. 该文件参见《党的建设》，第 186 页。

传》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曾表示，将有关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他感到“多少有点胆怯”。但是在《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一书中，却没再提到这类的“谦词”。译者在后记中，也提到是“向国内读者推荐这本学术著作”的。或许，这是因为著者与译者都对该书“一致看好”。《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一书的确也有其值得“推荐”之处，其资料的详实、分析问题的细致入微，都决定了该书是太行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中一本无法取代的重要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古德曼教授这一关于太行根据地研究的中译本，却存在着许多尚待修改之处，无论从史实、史料、文字表达等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推敲。

(作者李秉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3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李仲明)

《赵一曼传》

2005年7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云桥著《赵一曼传》，34.3万字。作者到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和赵一曼战斗的黑龙江尚志县调查采访，采访了东北抗联的老战士和赵一曼的孙女，广集史料。该书分十二章记述了赵一曼少年求学、参加革命、奔赴抗日战场、被捕后在敌人威胁利诱面前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一生。